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20.06.019

中共中央关于创办东北大学的 战略决策及其实施

曾鹿平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延安大学主体建制迁往东北,创建新型东北大学是中共中央全面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基于创办华北联合大学的历史经验;基于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扎根中国大地办高校,创办新型高等教育,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延安模式”伟大实践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基于将“延安模式”推向东北,进而推向全国。延安大学为东北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正是中共中央这一战略决策,使得“延安模式”在东北大学得以直接传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1950年东北大学易名东北师范大学,开启了新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延安大学;东北大学;战略决策;延安模式

[中图分类号] D231;G64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20)06-0139-11

梳理延安大学主体部分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历史,我们能够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中共中央确定并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是其前提条件。同时,延安大学的发展历史、特征及其成就,又是中共中央将其纳入实施这一战略方针重大部署的决定因素,两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延安大学为新型东北大学的创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延安大学主体部分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以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大学主体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是中共中央实施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重要部署

认识延安大学主体部分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历史及其意义,了解和认识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确定与实施,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大学主体部分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重大部署的决定是历史前提。

(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确定与实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然而,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又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因此,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从整体形势看来,抗日战争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1]为了实现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粉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策略方针,中共中央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做

[收稿日期] 2020-05-29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招标项目(2016ZB025)。

[作者简介] 曾鹿平,男,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同时,在文化、科技、教育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其中“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就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方针,甚至被称为“抗战后延安走得最高超的一步棋”^[2]。

所谓“向北发展”,就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3]。所谓“向南防御”就是收缩战线,将南方几个解放区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集中兵力,准备应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举进犯,以保障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因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全国性战略方针,重点是向北发展,关键是控制东北”^[4]。为什么说“关键是控制东北”呢?这是因为:第一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东北地区北、西、东三面都是友邻(苏联、蒙古、朝鲜——笔者注),有了东北就有了巩固的战略基地;第二,国民党在东北无一兵一卒,统治薄弱;第三,东北幅员辽阔,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实力雄厚^[5]。还有一条,那就是苏联红军为消灭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投降而进入并占领东北。所以,在党的七大结论和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接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基础就更巩固了。”^[6]¹²⁰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中旬命令冀热辽、晋察冀、晋绥等地区的部队,向日本侵华基地东北展开猛烈的大反攻,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收复了大片的国土,控制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中共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根据地。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9月1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做出发展东北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我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是千载一时之机。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伍修权、程子华、林枫为委员,并于当天从延安启程,乘飞机飞往东北。1945年9月17日,刘少奇致电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这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最初表述。”^[7]1945年9月19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这一部署。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正式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连夜,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党内指示电,向全党公布“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及其具体部署。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等前往东北。随后,中共中央又先后派遣四分之一新当选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前往东北,以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并组织关内2万干部和10万主力部队进入东北。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也是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历史前提。

(二)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以往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实施,学者们都是从政治、军事、组织、干部等角度来论述,当然这是当时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前提条件,但很少有人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来阐述这一问题。实际上中共中央对于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是全面部署的,除政治、军事、组织、干部、经济之外,也在文化教育方面做了精心部署。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就是重大部署之一。

1945年10月间,延安大学接到上级通知,中共中央决定:延安大学的自然科学学院,鲁迅艺术学院,行政学院的大部分迁往东北继续办学,创建东北大学^[8]¹⁷⁶⁻¹⁷⁷。

虽然我们尚未看到中共中央这一决定的原始文件,但从以下三个史实中我们完全可以确认中共中央这一重要决策是历史事实。一是时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到东北后任东北大学常务副校长、校长张如心的回忆;二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相关会议记录;三是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及东北局发出的电报指示。特别是笔者2007年从中央档案馆查到这一电报指示的原件,使张如心等人的回忆得到有力证实。

据张如心回忆:当延安大学的大部分教职员和学员离开延安之前,1945年10月25日晚,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交际处小礼堂接见了校长周扬、副校长张如心,以及学校和各学院主要领导干部与骨干教

师,还有学生代表。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交际处小礼堂内灯火辉煌,大家都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围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周扬校长介绍了被接见的师生,毛泽东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向师生们讲述了学校迁移东北的意义和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学校向东北转移的目的在于创办“新型的东北大学”^{[9]2}。他说:“你们创办的东北大学,是新型的大学。因为东北青年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 14 年,奴化教育的影响很深,要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和军队,坚持八年抗战,最后取得胜利。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9]2}毛泽东还特别叮嘱学校领导:“军队要建设一个团或师,比较容易;要建设一个大学,从领导班子到队伍都不容易。在行军过程中,各地可能找你们要干部,你们不能把班子人员搞散,要千方百计地把建校的班子搞好。”^{[9]2}他勉励大家:“你们去东北,那里形势紧张,是必争之地。现在还是敌强我弱。你们去东北的任务是争取青年,办大学。你们这次去,冰天雪地,可能有害病的,还有可能牺牲的。遇到问题要分析,一半是困难,一半是光明。因为是必争之地,事不宜迟,说走就走,我们的‘飞机’就是两条腿。”^{[8]177}

1945 年 4 月至 6 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此时中国革命处于重大转折时期,加之毛泽东刚刚从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归来,真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仍然在夜晚亲自为将要赴东北的延大师生送行,亲自向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阐述学校迁移东北,创建新型东北大学的任务和意义,亲自叮嘱鼓励,这足以证明毛泽东对创建新型东北大学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延安大学的殷切期望。同时,也说明中共中央对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决定是十分郑重的,是一种战略决策。

1945 年 10 月,习仲勋接替赴东北的高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1 月 1 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务会议,专题讨论延大问题。习仲勋开题讲道:“昨天周扬谈(延大)全部走,商量结果还是要办,培养必要的干部。”^[10]他同时就留延安的延安大学的领导班子及相关问题谈了意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表示:“延大要办。”^[10]本来 1943 年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延大、鲁艺与自然科学院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管理,也就是说,延安大学的直接上级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与边区政府,周扬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的校长,那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会议上所讲的“商量结果”,显然不是同延大校长周扬商量。因为作为校长,周扬没有决定学校从延安走与留这样重大问题的权力,所以习仲勋书记所讲的这个“商量结果”,一定是西北局与中央商量的结果。同时也说明,延安大学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是党中央的决定。另外,党中央也同意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请求,在延安保留延安大学建制,继续办好延安大学。

1946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及东北局发出电报指示:“前决定开东北后又停张垣的党校及延大两学校仍即经赤峰开东北。”^[11]电文所指出的这个“前决定”,就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时的决定。由此可见,在延安,中共中央已做出了明确的决定:延安大学主体部分迁往东北创建新型东北大学。因此,可以说延安大学主体部分全部迁往东北创建新型东北大学,是中共中央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部署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支援战争、土地改革、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五大任务。当然,前提是政治、军事、组织、干部工作,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与军队发展,是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但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基础在经济和文化教育。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6]120},原因是“我们的根据地,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6]120},而东北当时是全国大工业、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所以“现在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6]120}。那么,要接管这些大工业、重工业当然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而要发展这些大工业、重工业更需要科学技术和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因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重中之重。另外,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期间,为了实施殖民统治,奴化东北人民,掠夺东北丰富的资源,支撑其侵华战争,也在东北建立了二十多所各种各样高等院校。因而,当时的东北也是全国高等院校较集中的地区,这些高等院校的接收与改造,亦是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实施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在东北地区迅速推行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对东北地区的殖民化教育进行彻底改造,这更是这一战略部署的核心目标。

二、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的原因与意义

作为中共中央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东北大学是具有历史原因的。其原因很多,但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一是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创办华北联合大学的历史经验;二是要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好大学的实践成果——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推向东北,进而推向全国,这也是其重要意义的核心所在。而延安大学正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标志性成果之一,集中体现了“延安模式”的特征与成就。

(一)华北联合大学创办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国进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大量沦陷区和国统区先进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子为了抗日救国,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像潮水般纷纷涌向延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12]“因此,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培养和吸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13]为使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适应并服从抗战事业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制定了国防教育的方针政策,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在国防教育方针指导下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在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中,高等干部教育不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颇具特色,成效显著”^[14]。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与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从1937年春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之后到1939年7月,中共中央又先后创办了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此外还有马列学院、延安工人学校等。除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外,这些干部高等学校都办在延安。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华北敌后抗日局势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八路军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北敌后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华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极其重要的战略根据地,也使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异常震惊。1939年春夏以来,日军增兵华北,对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围剿“扫荡”,华北敌后抗战局势日趋紧张。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了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封锁和骚扰,延安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联系由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扫荡”封锁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了解决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各类人才的急需,加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培训,就近为华北地区培养专业人才,中共中央决定以陕北公学为主体,将鲁迅艺术文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一部分、延安工人学校之全部合并,在延安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原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担任校长和党团书记(陕北公学于1939年12月在延安复办,由李维汉任校长,史称后期陕公,这也是延安大学的直接前身之一)。

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后,成仿吾校长立即率领一千多名师生员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八路军纵队的名誉,从延安出发,突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道道封锁线,千里转战向华北敌后挺进,最终到达晋察冀边区办学。这是中共中央抗战初期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之外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干部学校。从1939年7月到1948年8月,整整九年时间,华北联合大学在华北敌后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在晋察冀边区辗转办学,为晋察冀边区和华北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吸收培养了大量沦陷区、国统区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培训了大批在职各级各类干部,成为晋察冀边区乃至华北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才摇篮和干部基地,做出了特殊而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延安之外最著名的大学。

抗战胜利后,华北联合大学迅速开始正规化办学,1946年1月底与延安大学合并。1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晋察冀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组建华北大学,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整个解放区规模最大的综合大学,也是最重要的大学之一。1949年12月,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

华北联合大学办学实践充分证明,以陕北公学为主体在延安创办华北联合大学的决策是非常成功的,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而中共中央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之际,东北的局势和战略地位与抗战初期华北的局势和战略地位非常相似,所以借鉴华北联合大学创办与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延安大

学为主体创办东北大学就非常自然,符合实际与逻辑。

(二)延安大学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标志性成果之一

延安大学是中国的一所特殊大学,它诞生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时代。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高等院校办学中国逻辑、中国特色的结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兴办普通高等教育的成就与经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历程。

1941年,延安的高等学校正逐步形成向正规化和专门化方向发展的趋势。194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预祝一九四一年延安干部教育的胜利》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关于延安方面的干部学校教育,抗战初期所采取的三几个月的短期训练班的方式,一般地已经过去了。依我看来,延安的干部学校正处在这种短期训练逐渐进到正规学校的过渡之中。”^[15]这不仅仅是李维汉个人的意见,也是以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为代表的党中央许多领导人与党内相当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与意见,而延安大学的创办正是这种认识与意见的实践产物。

1941年7月2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了有朱德、洛甫(张闻天)、陈云、凯丰、康生、王明等多位政治局委员,还有高岗、邓发、王首道等各方面领导人参加的“改革中央组织机构与筹备总供给委员会”会议。会议研究了洛甫(张闻天)提出的“青干、女大、陕公等合并成立大学”的意见。经过讨论,会议决定组成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中央学校管理委员会主任凯丰为主任,罗迈(李维汉)、柯庆施、徐特立、冯文彬、周扬、王鹤寿等为委员的学校合编委员会,提出合并具体方案及教育方针与计划,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批准。

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于1941年7月13日和30日两次会议研究了学校合编委员会提出的合编方案。7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以“陕公、女大、青干、鲁艺学院、自然科学学院五校合并成立联合大学”,“该校定名为陕北联合大学”^{[8]54}。原学校合编委员会成员由7人增加到8人,增加了赵毅敏。但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改变了上述决定并做出新的决定:“青干、陕公、女大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16]学校受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领导。延安大学创建是按照这一决定实施的,校名的改变,据吴玉章回忆是由毛泽东亲自提议的,他明确表示“还是延安大学好”^{[8]305}。

1941年9月22日,延安大学正式成立,学校设立了三院三系和一个中学部,并由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著名法学家、曾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副院长的何思敬担任法学院院长;著名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期在北京大学研究心理学的刘泽如担任教育学院院长;由留苏的越南籍俄文专家黄正光担任俄文系主任。此外,由当时延安的英文专家许乃生担任英文系主任,中学部主任由上海大厦大学教育专业毕业、曾担任鲁迅师范学校校长的林迪生担任,由英国利物浦大学工程硕士毕业回国的赵飞克担任学校秘书长,并规定学制本科为三年、专修科二年,三个学院为本科,俄文、英文和体育三系为专修科。当时大学部是按照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入学标准遴选与招考的,所以人数很少,只有500多人。

延安大学与此前的干部高等院校明显不同,它是按照现代大学体制创建的一所新型大学,具有明确的学科专业划分与学制,有较为明确的入学标准与资格,并由专家学者担任学校及院系领导,具有干部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双重功能,并强化了其面向社会的普通大学的功能,更明确地说,它具有高等院校办学的社会需求逻辑与学科逻辑相结合的鲜明特征。“这种教育体制注重的不仅仅是价值观、世界观的革命化改造,而且注重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应用;不仅仅是被培养者接受速成式的训练,而且注重被培养者深厚科学知识底蕴的积聚。”^{[8]55}

1943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延大、鲁艺与自然科学学院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管理。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合并后的延安大学成立了由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周扬、刘春、陈康白、宋侃夫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吴玉章任校长,周扬任副校长,宋侃夫任秘书长。鲁艺院长由周扬兼任,院以下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系。戏剧系负责人为张庚,音乐系负责人为吕驥、贺绿汀,美术系负责人为江丰、王曼硕,文学系负责人为何其芳。自然科学学院院长陈康白,副院长恽子强,院以下设化工、机

械、农业三系,系主任分别为李苏、阎沛霖、乐天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先后由刘披云、何干之担任。院下属一个研究室,由何干之、姜君辰负责。民族学院院长为刘春,新文字系由王子匀任主任。中学部主任为林迪生。

1944年4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做出决定: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并,作为边区政府设立之大学培养为边区服务的人才。学校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领导,边区政府任命胡乔木、李卓然、周扬、王子宜、刘景范、柳湜、宋侃夫等七人组成“延安大学临时教育委员会”,周扬任校长,王子宜、张如心先后任副校长。此时,延安大学设立了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和一个独立的医学系。行政学院院长初由副校长王子宜兼任,后边区政府调三边分区专员强晓初担任,设有行政、财经、教育、司法四系,分别由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财政厅厅长高自立、教育厅厅长柳湜、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兼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由周扬兼任,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三系,系主任分别为周巍峙、蔡若红、舒群等。自然科学学院院长由中央军委军工局局长、著名的无线电专家李强兼任,副院长恽子强,设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农业三系,医学系设有医生班、司药班、助产班、护士班、中医班、兽医班。全校共11个系,近30个专业。另外,行政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还设有研究室招收研究生。据1944年6月统计,全校教职员575人,学员1302人,成为一所文、理、工、农、医、教、艺术等学科设置较为齐全的综合大学。正如一些教育史家明确指出的:“这是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第一所具有工、农、文、理、医、艺等科的综合性的高等学校。”^[17]

郝瑜等在《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指出:“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逻辑不同于西方。西方高等院校办学遵循学科逻辑,强调办大学就是办学科。”“中国高等院校办学遵循的是社会需求逻辑。这种逻辑强调高校办学首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3]而这种办学逻辑除其他因素外,也“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成功经验”^[13]。其中,延安大学则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的实践探索者,是其标志性成果。

由于延安大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创建的一所综合大学,经过三次调整合并,延安重要的带有社会性和普通高等学校性质的专业学院均并入延安大学,真正成为延安的“最高学府”。毛泽东对延安大学的办学高度重视,亲自指导。1944年5月24日,新组建的延安大学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等亲临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讲话的核心就是阐述延安大学办学的逻辑与方针,强调延安大学办学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要求延安大学不仅要为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工作服务,而且要为全国的抗日根据地服务。他指出:“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安大学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18]154}他特别强调了延安大学与各个抗日根据地建设发展的关系:“总之延安大学要为各个抗日根据地服务。根据地的工作上了轨道,我们陕甘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项工作上了轨道,就使得我们的学校也上了轨道。”^{[18]152}而且,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具体而详尽地指明了延安大学为陕甘宁边区服务的内容、任务与目标,亲自指导延安大学如何遵循社会需求逻辑办好学校。

根据毛泽东、朱德的讲话精神,以高等学校办学社会需求逻辑为主体,结合学科逻辑新组建的延安大学,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办学体制,从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管理体制到学科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与实践。从1943年3月到1945年10月,经过两年半时间的探索与实践,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体制机制。所以,中共中央决定以延安大学为主体,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是深思熟虑的,是具有现实基础的。这个所谓“新型”,其实就是延安大学的这个“新型”,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中国高等院校办学逻辑,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延安模式”。

所谓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陕甘宁人民在发展、建设高等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办学体制、管理制度、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招生和学生管理等高等教育要素的集成”^[13]。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基本特征,笔者在《重温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22日),及与其他学者合作的《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及其当代价值》(《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11期)两篇论文中做了比较系统与详细的论述,这里只做以简要介绍。

中国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是一种创新型模式,因此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各个方面,也有不同层次,但其核心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思想;二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校长负责制、学者治校和民主管理;三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四是强调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心工作,学以致用办学逻辑与理念;五是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办学体制;六是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多样化的招生制度。除此之外,还具有“少而精”和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面向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科研导向,以自主管理为核心的学生管理体制,以研究室为平台、研究员带研究生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多样化的学生考核制度与方式,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等鲜明的特色。延安大学集中体现中国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经验与成就,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三、延安大学与东北大学的创办与发展

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战略决策的实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延安大学“东北文工团”到达东北,及其在东北地区的广泛活动为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外,由于战争局势的瞬息万变,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东迁途中发生了变故。因而,东北大学经历了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凯丰具体领导,“东北文工团”部分成员为主体筹办并先期成立,后又与延安大学迁校队伍会合的历程。

(一)“东北文工团”在东北的活动、延大东迁受阻张家口与华北联大暂时合并集结待命

中共中央做出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决定,是在中共中央正式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开始全面实施之后。但为了使文化教育更好配合和服务于伟大的解放战争,延安大学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此之前已经着手动员和组织师生员工,以文艺工作团的形式,分头奔赴东北及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工作。

1945年8月21日,延安大学从鲁迅艺术学院派出由陈荒煤带队,葛洛、赵起杨、胡征、陈因、计桂森等参加的工作团,首批前往山西太岳地区开展工作。紧接着,延安大学以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员工为主力,又组织了两个文艺工作团,这两个工作团每团都有五十多人,受命去华北和东北解放区。

“华北文艺工作团”由艾青、江丰等率领,于9月12日从延安出发,赴张家口市,与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联合排练演出了新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等延安时期创作的剧目,在华北解放区进行宣传动员工作,后来全团转入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成为该学院领导、教学、创作与演出的骨干力量。

“东北文艺工作团”由舒群、田方等率领,于9月2日从延安出发直奔东北新解放区。到东北后,这个工作团又改编为“东北文工一团”,由沙蒙、王大化任正副团长,足迹踏遍了整个东北。以哈尔滨为中心,向北去过齐齐哈尔、嫩江、克山、地安等地,向东先后抵达绥化、佳木斯、鹤岗、牡丹江、图们江以及朝鲜的清津、咸光、平壤等地,向西到达乌兰浩特、白城子、康武、阜新等地,向南历经长春、公主岭、四平、铁岭、沈阳、鞍山、本溪、丹东、大连等地。“东北文艺工作团”在各地演出《白毛女》《血泪仇》《日出》《黄河大合唱》《做军鞋》等剧目,参加东北地区艰苦卓绝的人民解放战争和民主改革运动。后来全团转入东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并组织了两个文工团,吕骥任第一文工团团长,张庚任第二文工团团长,因战争形势的变化又经历了一些变迁,在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从大城市撤退后,参加发动农村群众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土改斗争,直到1948年沈阳解放后,才将分散在佳木斯、牡丹江、辽南、哈尔滨的几个文工团的人员集中起来,在沈阳恢复成立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开始重建党的文学艺术教育基地,为文艺事业培养新的大军,迎接全国的解放。

延安大学东北文工团到达东北,以及在东北的广泛活动,扩大了延安大学特别是鲁艺在东北的影响力,为东北大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45年11月中旬,迁移东北、华北解放区的延安文教单位组成一个支队,延安大学是其中的一个大队,行军编号是“松江支队第四大队”,校长周扬任大队长,副校长张如心任副大队长,秘书长刘呈云任副大队长兼政治部主任。下属三个中队:鲁艺是第一中队,中队长宋侃夫;自然科学学院是第二中队,中队长王甲钢;行政学院是第三中队,中队长于光远。

迁移队伍按所设兵站的里程一路行军,经过陕西省的延川、子长、清涧、绥德过黄河到绩口镇,北上经山西省的临县、兴县、岢岚、五寨、平鲁、左云到达绥远省的丰镇,又经山西省的阳高、天镇进入察哈尔

省,顺铁路线途经紫沟堡,分别于12月20日至25日,到达张家口市西南郊的孔家庄,经一周整休,然后迁入城内。校部和三个学院分别居住。但此时的局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也深知东北的战略意义,在中共中央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同时,国民党也制定了“控制华北,以图东北”的战略规划,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争夺东北。

1945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就已经占领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承德、锦州,封锁了山海关,华北解放区通向东北的道路被国民党军队切断。延安大学迁校队伍无法前往东北完成创建新型东北大学的使命,中央电令延大迁校队伍暂留张家口市待命。

此时华北解放区也急需加强高等院校建设,以培养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前往东北的道路短期内难以打通,因此晋察冀中央局想借此机会将延安大学迁校队伍留在华北并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晋察冀中央局于1946年1月28日向中共中央发电请示,电文的第二条内容是:“延大与联大合并,成仿吾任校长,周扬任付(副)校长,可否,请即示。”^[19]第二天,即29日,中共中央就复电:“同意延大、联大合并,成任校长,周副之。”^[19]回电虽很短,但完全同意了晋察冀中央局的意见。于是,延安大学迁校队伍迅速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仿吾任校长,周扬任副校长,张如心任教务长,刘呈云任党委副书记。与此同时,聂荣臻又向中央报告,说去东北的道路不通,晋察冀边区工业企业很多,很需要技术人员,建议将自然科学学院从延大迁校队伍中抽调一部分留在华北。中央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自然科学学院一部分和晋察冀边区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校名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科学校,受晋察冀边区教育局领导。由原延大自然科学院副院长恽子强任校长,原延大自然科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阎沛霖任教务处长,阎沛霖赴东北后,由王甲纲继任。

(二)东北大学的创办

形势的变化已不能顺利实现原定方案,但东北地区急需培养大批干部,不能坐等延安大学的到来。早在舒群带东北文工团到达沈阳时,舒群、张松如(即公木,1941年5月任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主任,1942年9月,调鲁艺文学系任教)等就曾“接受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筹办东北公学。仅做酝酿,未着手,便转移到本溪”^{[9]2}。1945年11月之后,东北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主力部队开始武力占领东北主要城市与交通线。为了避其锋芒,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实施“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即让开大城市,到分散的中小城市和广阔的农村建立根据地。11月24日晚彭真率东北局机关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撤出沈阳,26日撤到本溪,辽宁省政府也同时撤到本溪。这样,本溪一时就成了东北根据地的政治中心。

1946年1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凯丰约见了曾任延大鲁艺文学系主任、原延安大学“东北文工团”团长、此时任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副主任的舒群。“告知舒群:东北局成立后,争取青年工作遇到很多问题,所以东北局要宣传部具体负责办一所学校,学校的形式和名还没定,艺术大学、青年干校、东北公学哪个形式更适合尚待研究。经过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还是模仿共产党延安大学的前身、1937年创办的以培养青年政治干部为主的陕北公学形式创办东北公学为好。”^{[20]55}并指示他聘请时任中共本溪市委宣传部的张松如,及时任沈阳市市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著名病理学家白希清教授参加筹备工作。“在当时辽宁省主席张学思,沈阳市市长白希清帮助和支持下,抽调了十多名老干部,拟定计划,修建校舍,1945年末到1946年初开始招收学员。当时到辽东,辽南及本溪,辽阳,抚顺等地,一个个动员,一个个招收。”^{[9]2-3}1月10日前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由白希清任东北公学校长,舒群任副校长,张如松任党支部书记兼教育长,学校在本溪宣告成立。“不久,根据辽宁省委书记江华同志的意见:国共两党要谈判,国民党有东北大学,我们也要办东北大学”^{[9]3},1946年2月份,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东北公学改名为东北大学,任命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辽宁省主席张学思兼任校长,白希清、舒群任副校长,张松如任党支部书记兼教育长。张东川(曾任延大鲁迅文艺学院戏剧部秘书)任秘书处长,校长办公室主任黄耘,研究班主任李先民,预科主任许法,副主任肖岩。“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献身于新中国,新东北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实业、医学等的专门人才’。学制先定普通班为一年,预科为半年,研究班时间不限。建校初,从辽宁省东丰、安东省海龙,辽南行署抚顺、辽阳各地招来七十多名学生(另有二百余名的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学校北上时移交给辽宁省人民政府)……学生刚刚在本溪市集中,由于国民党军进迫,形势陡变,乃整队迁往安东,今日丹东。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借用当时安东省安东联中校舍,宣布开学。”^{[9]3}随后东北大学在战火中辗转于通化、梅河口、吉林、长

春、哈尔滨,1946年6月定址于佳木斯。

关于中共东北大学的两次筹建(1945年10月在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建东北大学;1946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本溪决定创建东北大学)的关系,以及东北大学创建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存在争议。

曲晓范、石颖在《民国中共东北大学筹建、成立、迁校时间考》一文中,根据一手资料对此进行了详细而科学的考证,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结论也是可靠的。但这里的核心应是两次筹建之间的关系:“中共东北大学的筹建共有两次,决定该大学最终建立的是第二次筹建。第二次筹建、创建始于1946年1月,共历时两个月,直接领导和组织第二次筹建过程的是当时分别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东省委、中共本溪市委主要领导职务的江华、凯丰、舒群、张松如、白希清、黄耘等人。”^{[20]58-59}第一次筹建的主体是中共中央,第二次主体是中共中央东北局,这是没问题的。但这两次筹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首先,第二次筹建是由于战争环境的客观现实所造成;其次,第二次筹建其实也是第一次筹建在特殊情况下的实施。

《民国中共东北大学筹建、成立、迁校时间考》引用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这就是张松如1949年担任新东北大学副教育长时期的工作日记,日记的内容是1949年10月24日,学校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就“关于东大简史”所作的发言记录:“1945年秋,延大派出一部分文艺干部(教员、研究生、学生)到东北来,十月抵沈。先进行文艺活动,后拟办、筹办学校——艺术大学、青年干校、东北公学,最后确定办东北大学。”^{[20]58}由此我们得知,从延安大学派出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其任务是“先进行文艺活动,后拟办、筹办学校”。同时,在沈阳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已指示“东北文艺工作团”团长舒群与团员张松如“筹办东北公学”。为什么是东北公学而不是东北大学,很可能是为延安大学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做前期准备,这与延安时期先有陕北公学后有延安大学是一致的。

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这项计划“仅做酝酿”,而在本溪创建东北公学是1946年1月份,改称东北大学是2月份。此时正是延安大学东迁队伍在张家口市待命,以及中共中央1月29日回电同意其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的时间。而本溪时期东北公学与东北大学的创建,“其中江华、凯丰、舒群、张松如四人贡献突出”^{[20]58-59},这里还应包括学校秘书处处长张东川。同时,由东北公学改为东北大学虽是由江华提出的,但学校创办的核心领导人却是凯丰。1941年以陕北公学为主体创建延安大学时,凯丰是筹建委员会主任,是延安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他对延安大学比较熟悉,对舒群也比较熟悉。1945年9月,凯丰到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长,直接分管教育工作,凯丰对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大学主体整建制迁移东北,创办东北大学的决定应是知情的,所以作为学校的主要创办者,他自始至终并未提出使用东北大学这个校名。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等发出的要求延安大学继续前往东北的电报指示,题头明确标示“聂刘、并告东北局”^[11],由此可推断,1945年11月25日,延安大学迁校队伍从延安出发,以“松江支队第四大队”的番号向东北挺进,一定会电告中共中央东北局,起码要告知东北局宣传部,因为当时宣传部是党的教育主管部门,此时凯丰是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长。另外,中共中央1945年1月29日复电晋察冀中央局同意联大、延大合并的指示,也是应同时告知东北局的。所以凯丰对这些情况都应该是了解的,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由凯丰领导,从沈阳到本溪最初创建的校名都是东北公学而不是东北大学,直到2月份由江华提出改为东北大学,才得到凯丰的认可和东北局的批准。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凯丰还是一直在等待延安大学东迁队伍的到来,以落实中共中央在延安做出的以延安大学为主体,创建新型东北大学的决定。所以凯丰一直是让舒群牵头创办东北公学,并指名要求舒群调张松如一起筹办。事实上东北公学与东北大学一直是在凯丰直接领导下,由舒群、张松如具体筹办。建校初期的主要领导人舒群、张松如、张东川等都是由延安大学派出的“东北文艺工作团”的成员,都是原延安大学的干部、教员。在张如心率延安大学整体迁校队伍到达东北之前,又有萧军、吕骥、张庚、吴伯箫等一批“东北文艺工作团”的成员进入东北大学。

学脉以学人得以传承。东北公学也好,东北大学也好,其创办者、领导者与骨干教师均以延安大学的创办者、领导者与骨干教师为主体。因而,在本溪创建的东北公学与东北大学在事实上已经初步实现了中共中央以延安大学为主体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决定精神,只是因为战争形势的变化,其创建的方式才有所变化。当然,这还不够。于是,华北前往东北的道路一打通,中共中央便立即电令由延安大学主体部分组成的迁校队伍继续由华北前往东北。因此,我们认为,中共东北大学的创建应追溯至1945年

10月份,中共中央决定以延安大学为主体创建新型东北大学之时,它的直接源头是延安大学。

(三)延安大学东迁队伍与东北大学的会合及东北大学的发展壮大

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及东北局发电指示:“东北需要干部正多,并需要培养干部的教育机关正急,前决定开东北后又停张垣的党校及延大两学校仍即经赤峰开东北,何时能赴程,望告。”^[11]这个电报指示明确表明,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在延安所做的将延安大学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建新型东北大学的决定。虽然此时东北大学已经成立,延安大学迁校队伍也与华北联大合并,但正如中央指示电所指出的,“东北需要干部正多,并需要培养干部的教育机关正急”。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大学所实行的新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模式的探索实践已基本成熟,需要在新的战略根据地——东北地区示范与推广。加之前往东北的道路已打通,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延安大学继续前往东北地区,而且电文要求“何时能赴程,望告”,表达出明确的态度与急迫的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由张如心(队长),刘呈云(付[副]队长)同志率近三百六十余名教职员工”^{[9]2}(另一说,张如心、刘呈云带一百多人),从张家口出发,继续前往东北。经赤峰、洮南、白城、齐齐哈尔,六七月间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哈尔滨,分别受到当时东北局领导彭真、林彪、陈云和凯丰等的接见。同时,他们与东北大学驻哈尔滨办事处汇合,在哈尔滨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招生。1946年8月底前,张如心等率领近200名师生到达佳木斯,与舒群、张松如等先期抵达佳木斯的东北大学师生胜利会师,完成了延安大学迁校队伍离开延安的最终目的,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战略决策的目标。

两支队伍会合后,学校迅速发展,“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东北人民的东北大学,在佳木斯市东北电影院补行开学典礼。学校已正式上课两个多月,去哈尔滨市遣送日侨的学生回来了,在哈尔滨市演出《白毛女》的文艺工作团也回来了。修建了校舍,充实了设备,规模日益扩大。新生先后报到已达六百余人,教师增聘廿余”^{[9]8-9},不久学校招生达到一千余人。

原延安大学干部、教员,此时担任东北大学领导的主要有:第一副校长张如心(主持日常工作)、副校长舒群,教育长张松如、秘书长兼校长办公室主任刘呈云,教务处处长兼社会学院院长姜君辰,鲁迅文艺学院院长萧军,副院长吕骥、张庚,教育学院院长张松如(兼),副院长吴伯箫、智建中,自然科学学院院长阎沛霖。另外,王曼硕、舒非、向隅等分别担任各系系主任,成为东北大学的主体力量。延安大学原来的一批教师、学员,如张水华、马可、唐荣枚、王季愚、瞿维、寄明、沃渣、张望、刘炽、陈紫、戈扬等成为这一时期东北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骨干。

此时东北大学的领导干部和教师,主要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先期到达东北的延安大学东北文工团部分成员,一部分是原延大副校长张如心所带的从华北联大调出的延安大学的领导干部、学者、专家(包括少量华北联大的人员),另一部分是东北地区知名的教授、学者。这三部分干部和教师形成了一个新老干部结合、师资力量较雄厚、学术水平较高的阵容。而东北大学校、院、系主要干部均为原延安大学干部、教师,相当一部分骨干教师也来源于延安大学。可以说东北大学的主体与核心其实已经是原延安大学了,其思想、理念、方针、政策、教育内容、方式和体制机制也已全面移植于东北大学。而东北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其在东北地区的带动与示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东北地区各类人才的培养,伪满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以及大力兴办新型高等院校,支撑东北解放区的巩固发展,支援全国解放战争都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后东北大学又接收合并了原沈阳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等院校,几经变迁,不断发展壮大。“1948年7月,东北全境解放的前夕,东北大学迁往吉林,与中共吉林省委创办的吉林大学合并,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仍称东北大学。任命张如心为校长,吕振羽、张德馨为副校长,何锡麟为教务长,张松如、刘惠之为副教务长,刘呈云为副秘书长。校址在吉林市八百垄(即现在的东北电力大学校址)。学校于十月一日正式开学。当时设二部,学校有助教以上的教师一百五十五人,行政干部一百二十三人。佳木斯东大老生二百二十五人,吉林大学学生三百四十七人,原长春大学来的学生六百七十四人,国统区来的学生三百七十人,共一千六百五十四人。”^[21]“1949年6月,又从吉林市迁入长春市,经教育部同意把流亡平、津的原东北各大学的教职学员拨入学校,派智建中、周龙雏同志为招聘组,从平、津、沪、河南等地招聘付桐生等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又从老解放区派来老干部胡绍祖、陈元晖、孙亚明、丁克全教授等来校工作,充实了各级领导力量。”^{[9]15}使东北大学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

学(由于东北大学是在战争环境中办学,随着战局变化迁移变动比较多,曲晓范、石颖在《民国中共东北大学筹建、成立、迁校时间考》一文中,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这里不作详述)。1949年7月东北大学定址长春。1950年4月,根据东北人民政府的命令并经中央政府教育部同意,东北大学改名东北师范大学,开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崭新征程。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0.
- [2] 魏碧海,东北风.四野战事全记录[M].北京:长城出版社,2011:33.
- [3]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71.
- [4] 姚立新,党少博.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确定及其重大历史意义[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94.
- [5] 李壮.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形成[J].党的文献,1997(6):5-6.
-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 [7] 郭祥.刘少奇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2-3.
- [8] 曾鹿平.延安大学校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9] 张松如,刘呈云,武强.战火中诞生的东北大学[Z].东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1985.
- [10] 西北局会议记录:1945年8月15日至1946年12月28日[Z].陕西省档案馆藏,第68卷第2号.
- [11] 中共中央关于延大、党校速开东北给聂、刘并东北局电[Z].中央档案馆馆藏,1946,285:28.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 [13] 郝瑜,周光礼,罗云,等.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及其当代价值[J].高等教育研究,2017(11):80,84.
- [14] 刘宪曾,刘端葵.陕甘宁边区教育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144.
- [15] 罗迈.预祝一九四一年延安干部教育的胜利[N].新中华报,1941-01-16.
- [16] 陕公女大青干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N].解放日报,1941-08-28(1).
- [17] 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63.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9] 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古大存工作问题的请示及中央的决定[Z].中央档案馆馆藏,1946,285:28.
- [20] 曲晓范,石颖.民国中共东北大学筹建、成立、迁校时间考[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58-59.
- [21] 张松如,刘呈云,武强.战火中诞生的东北大学(1945.9—1949.9)(修改稿)[Z].东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1984:26-27.

The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of Establishing Northeast University by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ZENG Lu-ping

(The School of Marxism,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strategic policy of “Developing to the North and Defending to the South” was launched by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after the vic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which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solid northeast base and in winning the victory of the nationwide revolution. The main body of Yan'a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system went to the Northeast to establish a new-styled Northeast University, which wa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wholly. It wa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founding North China United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landmark achievement of Yan'an University during Yan'an Period, and also based on the fact that CPC would push “Yan'an Model” to northeast China, and then to whole China. Yan'an Universit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University. It is just because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s strategic policy “Yan'an Model” is directly inherited in Northeast University and Northeast University became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established by the CCP in northeast China. In 1950, Northeast University changed its name to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n it started a new historical process.

Key words: Developing to the North; Defending to the South; Yan'an University; Northeast University; Strategic Decision; Yan'an Model

[责任编辑:王 晓]